

論蘇聯的持不同政見運動

侯艾君

提起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一般人立刻會想到索爾仁尼琴 (Aleksandr I. Solzhenitsyn)、薩哈羅夫 (Andrei Sakharov)、麥德維傑夫 (Roy A. Medvedev) 等當年的政治明星、反抗蘇聯政府的「英雄」，但對於另一些人來說，他們的聲音和面貌可能早已湮沒在歷史的塵垢中了。他們到底是些甚麼人？他們的主張是甚麼？這是長期以來沒有得到學術界充分重視的問題。早於二十世紀70年代西方已有人研究這一問題；但在俄羅斯(包括蘇聯時期)，由於種種原因這一課題的研究要到1991年以後才真正沒有了人為障礙。麥德維傑夫等人也曾將蘇聯政府對待持不同政見者的政策以及持不同政見運動的文獻加以編輯、整理和發表。他們本身既是持不同政見者，又是此運動的研究者，他們的研究成果是人們了解這段歷史的重要途徑。1984年，移居美國的原蘇聯持不同政見者阿列克謝耶娃 (Lyudmila Alekseeva) 運用大量原始資料撰成《蘇聯持不同政見史》(История инакомыслия в СССР) 一書，是迄今有關這一問題最有分量的著作。此外，曾經也是持不同政見者的丹尼爾 (Yulii Daniel) 和西尼亞夫斯基 (Andrei Sinyavsky) 也為這一問題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蘇聯解體以後，許多俄羅斯學者開始研究這一學術問題，也取得一定的成果。

長期以來，蘇聯持不同政見者的主張沒有得到充分重視。蘇聯解體以後，許多俄羅斯學者開始研究這一學術問題，也取得一定的成果。今天慣用的「持不同政見者」是不折不扣的政治術語，但它並非嚴格的政治學術語。甚至人們公認的持不同政見者，如薩哈羅夫，就認為自己不是「持不同政見者」，而是「自由思想者」。

一 術語「持不同政見者」

「持不同政見者」在英語中叫做dissident，俄語叫做диссидент。該詞源自拉丁文dissidens，涵義是「脫離國教者」。該稱謂最初只具有宗教教派的意義，很大程度上等同於「異端」、「歧見者」。蘇聯出版的《現代俄語標準語詞典》對之的解釋是：「不信仰該國所認可的宗教的人」^①。1972年版的《蘇聯大百科全書》中則簡略地寫道：диссидент指「中世紀西歐諸國的所有叛教者(背叛天主教者)，教會

認為其為異教徒；以及宗教改革以後，不贊成在本國佔統治地位的信仰（天主教或新教）的基督教徒」^②。而在1983年出版的《蘇聯百科詞典》中，則只說是「在國教為天主教或新教的國家中，不贊成國教的基督教徒」^③。1978年投奔美國的蘇聯外交官、前聯合國副秘書長謝甫琴科（Arkady N. Shevchenko）也寫道：「持不同政見者一詞歷來只有宗教含義，而沒有政治含義，近來它指的是有不同想法的人，或和我想法不同的人。這是一種把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和布科夫斯基（Vladimir Bukovsky）之類的人物都包括在內的含糊其詞的辦法^④。今天我們慣用的「持不同政見者」則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政治術語（而非嚴格意義上的政治學術語），甚至那些人們公認的持不同政見者也不大認同這個稱謂：例如，薩哈羅夫就認為自己不是持不同政見者，而是自由思想者。

在西方的出版物中，「持不同政見者」是指那些反抗政治體制的反對者：「個人主要是用宣揚人權和民主政治的方式加入對政府權力體制的非暴力形式的反抗。爭取人權和言論自由的持不同政見運動基本上是與抗議蘇聯東歐的共產主義體制相關聯的」^⑤。這一定義失之狹窄，相較之下，俄羅斯當前出版的辭書對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所下的定義，似乎更接近歷史事實：「蘇聯持不同政見者是對那些公開反對政府的行動或者表現出其他為政府所不容的社會積極性的蘇聯公民而採用的一個術語」^⑥。

持不同政見者是否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都存在？有人認為是從來就有，而且是與人類的存在相始終的。廣義來說這是正確的，但實際上持不同政見者往往產生於權威主義體制之下（如70年代韓國的金大中、金泳三），人民在沒有政治資源與政權對抗的情況下，只能訴諸社會輿論來對政府施加壓力，為自己爭取更多權利。從這一意義來說，持不同政見者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現象。

如果說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加拿大的魁北克人、英國的愛爾蘭人也表現出某種反對主流文化或主流意識形態的傾向，那麼，持不同政見者可以說遍見於全球。但在西方學界以及新聞媒體中，「持不同政見者」往往特指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以及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某些國家的特定社會政治現象。在西方社會中，反對政府的力量可以組成反對黨進行合法的政治活動，而在蘇聯，要想參與政治只能參加一個黨——蘇聯共產黨，因而持不同政見者只能從事非法活動。有幾個特徵是各地持不同政見運動共有的：一、反對政府或反對主流社會的意識形態，游離於主流文化以外；二、多採用非暴力的手段表達政見；三、多數出現於集權社會。

蘇聯的持不同政見運動產生原因究竟為何？有人強調了其歷史原因：「說到持不同政見者，必須說的是，前蘇聯的持不同政見現象的獨特之處有其一定的傳統與根源」^⑦。也有人認為：「蘇聯經濟的衰退現象，蘇共遠非熱愛和平的外交政策，以及受到自上而下的控制的科學與文化的停滯，這一切反映在社會意識中，乃是政治解凍年代出現的諸如持不同政見運動這樣的獨特社會現象的根源。」^⑧實際上這種社會政治現象是由歷史和現實條件共同決定的。持不同政見運動的參加者中，有斯大林冤獄的受害者、有在二十世紀30到50年代被流放民

在西方學界以及新聞媒體中，「持不同政見者」往往特指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以及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某些國家的特定社會政治現象。有幾個特徵，是各地持不同政見運動共有的：一、反對政府或反對主流社會的意識形態，游離於主流文化以外；二、多採用非暴力的手段表達政見；三、多數出現於集權社會。

族的民族主義者、有遭到壓制的宗教派別、有正在成長中的公民社會，等等。他們受到壓制，怨憤和不滿沒有正常渠道宣泄，因此鬱積起來；而斯大林去世之後，赫魯曉夫 (Nikita S. Khrushchev) 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諸領域推行所謂「非斯大林化」改革。這種「解凍」使得從前被壓制的思想和感情更生，許多社會矛盾被釋放出來。

今天看來，赫魯曉夫的改革意義重大，它使蘇聯人民從個人崇拜的思想桎梏下解放出來。但是，他的改革是有限度的，在解凍的同時，蘇聯政府仍舊力圖控制意識形態。比較典型的是帕斯捷爾納克 (Boris L. Pasternak) 案件。著名作家帕斯捷爾納克將自己的小說《日瓦戈醫生》(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 拿到國外發表，並憑這部小說獲得1958年諾貝爾文學獎，這引起蘇聯政府的惱怒。帕斯捷爾納克被迫在《真理報》(Правда) 上發表聲明，指責西方將其小說用於政治目的。但蘇聯政府仍不滿意，因為他將作品拿到西方出版的做法，打破了政府對資訊的壟斷和對外部世界聯繫的封鎖。1958年10月，蘇聯作協決定開除帕斯捷爾納克出黨，這當然是在政府壓力之下做出的。這一事件的象徵意義在於：它向知識份子表明，他們無力對抗來自政府的壓力。

蘇聯的持不同政見運動始於何時？學者對此有不同說法。有人認為是從1953年斯大林逝世後開始；還有人認為是1957年赫魯曉夫「解凍」之後開始；也有人以1960年發生在蘇聯社會的政治事件為標誌^②。實際上，應該是在赫魯曉夫推行政治、文學、藝術等方面的改革——即「解凍」以後；此前只是一些零零碎碎、影響極為有限的個人反對活動，稱不上是一種運動。

蘇聯的持不同政見運動始於何時？學者對此有不同說法。有人認為是從1953年斯大林逝世後開始；也有人以1960年發生在蘇聯社會的政治事件為標誌。實際上，應該是在赫魯曉夫推行政治、文學、藝術等方面的改革——即「解凍」以後；此前只是一些零零碎碎、影響極為有限的個人反對活動，稱不上是一種運動。

二 運動的各個派別

蘇聯持不同政見者，大致可以分為以麥德維傑夫為代表的體制內反對派，以及以薩哈羅夫等人為代表的反對體制的反對派。但這個劃分方法較為籠統，如果稍微詳細地加以劃分，則大致包括以下幾類：

1、民族主義運動。這些民族多半在二十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受到蘇聯政府的鎮壓、流放以及其他不公正待遇：如克里木韃靼人、猶太人、日爾曼人、烏克蘭人、格魯吉亞人、亞美尼亞人等等。他們渴望恢復被剝奪的民族權利。他們的鬥爭形式主要是書信運動、抗議運動、示威遊行、集會等，以此尋求國際社會在道義和政治上的支持。此外，較鮮為人知的是俄羅斯的民族運動。俄羅斯的民族運動主要是想恢復東正教在俄羅斯社會和精神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實際上，在許多俄羅斯人心目中，能夠代表俄羅斯民族精神的是傳統的東正教。而這些運動的宗旨就在於使東正教世俗化，從而擺脫馬克思主義的束縛。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從西方傳入的意識形態，它毀滅了俄羅斯的傳統文化及其在社會中的整合作用。他們要求復活帝俄時期的關於俄羅斯的獨特發展道路的思想：即東正教、專制制度、國民性三位一體的思想，恢復村社傳統，與猶太

共濟會陰謀作鬥爭，等等。他們的代表人物是費季索夫 (Fetisov)、索爾仁尼琴等人。

2、宗教運動。蘇聯時期的宗教政策幾經變化。1917年以後，蘇聯實行政教分離，宗教自由得到充分保障。1929年，蘇聯政府通過了關於宗教崇拜的決議，實際上採取了完全根除宗教的政策。衛國戰爭開始後，當局釋放願意與政府合作的宗教人士，但是決心將其馴服，使其為政治服務。儘管受到種種限制，但是宗教集團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復興。在運動中，最活躍的是福音派的洗禮教派基督徒、五十日派 (因聖經故事而得名)、耶穌再生論派教徒、東正教徒等等。他們的活動主要是追求信仰自由，反對官方迫害，並要求自由移民。這些人的民族成分主要是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他們的活動與蘇聯和國際維權組織的活動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3、維權運動。維權運動的名稱不一而足，包括「民主運動」、「自由運動」、「公民反抗運動」、「爭取人權運動」等等。這是蘇聯持不同政見運動中最為核心的派別，存在時間也最長。而且維權派提倡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其主張主要是要求維護人的權利和要求政府遵守法律。正如一位俄羅斯學者所指出的那樣，要求遵守法律在蘇聯條件下是「革命性」的，因為這就等於要求蘇聯政府改變制度^⑩。

維權運動唯一認可的活動方式是運用和平手段與政府合作。他們有自己的出版物《時事紀聞》(Хроника событий)，由麥德維傑夫等人主編，定期通報最新的國內外社會政治動態。在其存在將近十五年的時間裏，所達到的目標和效果主要是：他們的倡議和號召在國內外得到傳播，他們的口號和主張為別的派別所接受；此外，他們的活動使得國際社會對於蘇聯的人權狀況有了更多了解，並贏得了國際輿論的支持。

4、爭取社會經濟權利運動。也有人稱之為「工人運動」或「獨立工會運動」，實際上都不夠確切。在這些運動中並不單單只有工人參加，甚至工人在其中不佔據多數。在這一領域的鬥爭在1978年前後開始，遠遠晚於宗教運動、民族主義運動以及維權運動。其主張是要求保護勞動者的權利，實現國際標準的社會保障水平，取消對殘疾人的勞動歧視，等等。此前在二十世紀60年代初期曾經有過一些罷工，但都不是為爭取社會經濟權利，而且當時多半不為人知。80年代，波羅的海三國以及基輔相繼爆發工人罷工，要求恢復原有工資水平，補發獎金。該運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波蘭團結工會運動的影響和鼓舞，並受到維權組織的支援。莫斯科赫爾辛基小組最先發表了有關爭取社會經濟權利運動的文件，而且從1978年以後，爭取社會經濟權利的主題在該小組的文獻中佔據重要地位。勞動者行業間自由聯合會是該運動的主要組織之一。運動的影響雖然不大，但反映了以工人為主體的蘇聯勞動者的教育水平及權利意識的提高。

5、反戰運動。和平主義 (pacifism) 起源於基督教的「勿以暴力抗惡」的思想。而俄國的和平主義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末的托爾斯泰 (Leo Tolstoy)。此後，

維權運動是蘇聯持不同政見運動中最為核心的派別，他們有自己的出版物《時事紀聞》，存在時間也最長。維權派提倡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其主張主要是要求維護人的權利和要求政府遵守法律。正如一位俄羅斯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在蘇聯條件下，要求遵守法律是「革命性」的，因為這就等於要求蘇聯政府改變制度。

該運動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所高漲。在赫魯曉夫「解凍」之後，和平主義運動繼續發展。以薩哈羅夫、卡皮查 (Pyotr L. Kapitsa) 等人為首的參與研製核武器的物理學家，抗議蘇聯恢復核試。此外，還有許多人文知識份子加入反對軍備競賽，他們被稱作「六十年代人」。在二十世紀70、80年代，俄羅斯十月革命前後的著名僧侶、和平鬥士西路安 (Silouan the Athonite) 的和平思想極大地影響了宗教界的知識份子，從而使東正教會成為以後重要的反戰力量。反暴力、反軍國主義、反軍備競賽、反軍事入侵是和平主義組織的主題。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及1979年入侵阿富汗都在國內引起較大的反戰運動。1982年「信任」團體建立，提倡美蘇之間建立信任，希望結束冷戰。之後，和平主義運動與人權組織的活動更緊密地結合起來，甚至直到二十世紀90年代都一直存在^①。

6、社會主義者。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的報告以及對斯大林的一些暴行的揭露，引起了許多人、尤其是共產黨員的震動，並在他們中間形成了政治上的反對派。他們並不要求推翻蘇聯的體制，但是對於社會主義有不同的理解和認識，並批評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及其制度，希望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他們的口號是「民主社會主義」。他們也被稱為「持不同政見的社會主義者」。他們中的著名代表人物有：格里戈連科 (Pyotr Grigorenko)、奧爾羅夫 (Yuri Orlov)、布科夫斯基等。按照本身就是社會主義者的麥德維傑夫的觀點，黨內民主派的社會成分包括在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以後的黨內年輕領導幹部，支持者則有來自科研領域的知識份子、經濟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甚至那些從流放地和斯大林的監獄中回來的布爾什維克。他們建立了一些主要由青年組成的半地下活動組織，撰寫了許多修養深厚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並在一些地方散發傳單等等。該派具有鮮明的民主色彩。

此外，還有一些極端反民主派別，如沙文主義、法西斯主義等派別。礙於其性質，這些派別很難得到發展，影響也很小。

在運動中，持不同政見者採用了獨特的「薩米茲達特」(самиздат，我國學者將之譯為「地下出版物」或「獨立出版物」)和「塔米茲達特」(тамиздат)的方式傳播思想，交流和分享資訊。許多人以為「薩米茲達特」全是地下出版物，是與非法的地下活動相聯繫的。但是近期的研究表明，情形完全不是如此。首先，直到二十世紀60年代中期「薩米茲達特」才變成顯著的社會現象，此前的「薩米茲達特」是很少見的；第二，大部分「薩米茲達特」都是合法的^②。「薩米茲達特」是蘇聯嚴格的文化審查制度造成的獨特社會現象。它的機制是這樣的：作者用打字機將自己的作品列印若干份，然後將複製品分發給熟人和朋友，如果他們覺得有價值或感興趣，就繼續複製分發給其他人。這樣，一些在蘇聯不能公開出版的作品，就在一定範圍內得以發表並流傳。

由於「薩米茲達特」有着這樣那樣的缺陷，人們在實踐的過程中就設法將其改進。有人將這些出版物交給西方記者或出版社，在國外合法出版後再運回蘇

在蘇聯嚴格的文化審查制度下，持不同政見者採用了「薩米茲達特」的方式傳播思想和分享資訊。其機制是作者將自己的作品打字並列印，分發給熟人和朋友，如果他們感興趣，就繼續複製散發。後來有人將出版物交給西方記者或出版社，在國外合法出版後再運回蘇聯。1957年帕斯捷爾納克在義大利出版《日瓦戈醫生》，就是先河。

聯，從而成為「塔米茲達特」。1957年帕斯捷爾納克將《日瓦戈醫生》拿到義大利出版，就是這方面的先河，此後很多人紛紛仿效。「塔米茲達特」是文學上成名的捷徑，但是這也就給了鎮壓運動者以口實，給持不同政見者加上「叛國者」的罪名。

對於這些持不同政見者，蘇聯政府進行了嚴酷的鎮壓。克格勃第五局專責偵破和鎮壓持不同政見者的組織。最新公布的材料表明，1966年之前，蘇聯政府對持不同政見者的鎮壓較為謹慎和輕微，但1966年以後，蘇聯政府感到原來的立法對於鎮壓運動顯得力不從心，因此考慮加強立法來對付不斷高漲的示威和其他活動，並主張對散發傳單這樣的行為處以刑事處罰^③。克格勃還對一些運動的積極份子採用了包括所謂「精神病療法」在內的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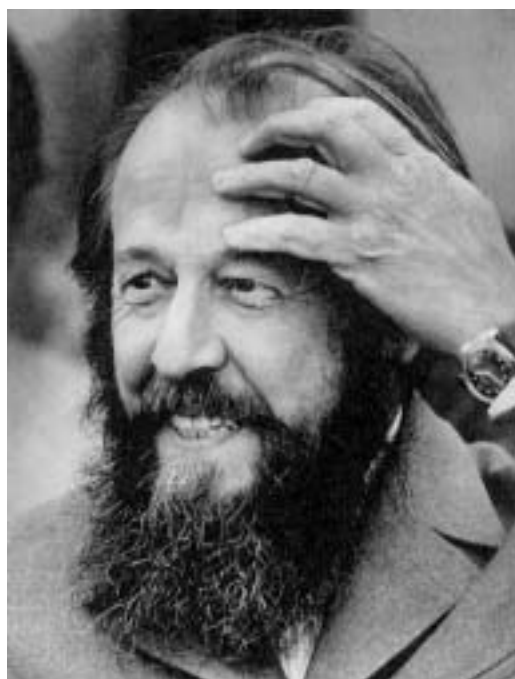
三 運動的階段及其特徵

為了研究的便利，我們不妨將運動作一分期。許多學者對這方面的看法既有區別，也有許多一致之處。第一個階段：從1956年到1965年，被稱作醞釀時期。這一時期的標誌性政治事件就是1953年斯大林的去世，這就使得斯大林時期被壓抑在冰層下的思想和感情開始萌動，也為新上台的赫魯曉夫進行改革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在這一時期，在嚴酷的政治壓抑和禁錮下潛藏着暗流。1956年赫魯曉夫的「解凍」，其非斯大林化的改革舉措大大解放了人們的思想。

第二個階段：從1965年到1972年是運動的形成時期。1965年12月5日是蘇聯的憲法日。為了抗議國家安全機關逮捕迫害作家丹尼爾和西尼亞夫斯基，著名

詩人葉賽寧—沃爾平 (Aleksandr Yesenin-Volpin) 組織了示威遊行，要求公開審判兩位作家，還布科夫斯基以自由。這是蘇聯國內自二十世紀20年代以後的首次示威遊行，被認為是維權運動的開端，因為它首次提出了維護人權的口號。這一時期的特點是：發起了為捍衛蘇聯人權而進行的「書信運動」；建立了第一批維權派小組和團體、第一批從物質上幫助政治犯的基金會；蘇聯知識界開始積極關注國外發生的事件，對蘇聯社會在赫魯曉夫改革之後又走向倒退（一般稱做「再斯大林化」），社會抗議增多；薩哈羅

1965年12月5日，為了抗議國家安全機關逮捕迫害作家丹尼爾和西尼亞夫斯基，詩人葉賽寧—沃爾平組織自二十世紀20年代以後蘇聯首次示威遊行，提出維護人權的口號，被認為是維權運動的開端。薩哈羅夫的著作《對進步、和平共處和思想自由的思考》，以及索爾仁尼琴(圖)的諾貝爾文學獎得獎演說的發表，形成了以他們為首的流派的綱領。



夫的著作《對進步、和平共處和思想自由的思考》(*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прогрессе, мирном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и и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ой свободе*)，以及索爾仁尼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獎演說的發表，形成了以他們為首的流派的綱領。1969年，第一個公開的協會「蘇聯人權捍衛倡導小組」成立。大規模運動於焉開始。在這一時期，運動範圍覆蓋全國，運動的社會成分也包括不同階層：工人、軍人、作家、藝術家、科技工作者，甚至政治上一般較為保守的農民——國營農場的工人。在這一時期，政府也加強了國家安全部門的職能，第五局成為專門監視持不同政見者的機構。政府還改變並加強法制，在俄羅斯聯邦刑法以及各加盟共和國刑法中，加入了190條第一款和第三款有關特別危險的國家犯罪：「系統地以口頭形式散布抨擊蘇聯國家和社會制度的明知虛假的謊言」以及「組織和積極參加集團活動，粗暴破壞社會秩序」這樣的條文；另一方面，蘇聯政府還設法切斷持不同政見者同國外的聯繫。

第三階段：1973年到1974年。這一時期是持不同政見運動遭到極大困難甚至是某種危機的時期。由於蘇聯政府加強了鎮壓，大舉逮捕持不同政見者，許多小組和團體被破獲，運動幾乎難以為繼。政府還在一些城市進行了大規模搜捕，搜索和查抄了各地的「薩米茲達特」。

第四階段：1974年到1975年。這一時期，蘇聯的持不同政見運動受到廣泛的國際認可，得到國外聲援。「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 在蘇聯設立分部。索爾仁尼琴被迫遷居國外，薩哈羅夫獲諾貝爾和平獎，《時事紀聞》也恢復發行。

第五階段：1976年到1981年，通常被稱作「赫爾辛基小組」階段。在這一時期，蘇聯簽署了《赫爾辛基協定》(*Helsinki Accords*)，這成為瀕臨崩潰的維權運動重新活躍的標誌。在蘇聯建立了以奧爾羅夫為首的「莫斯科協助執行赫爾辛基協議小組」(「莫斯科赫爾辛基小組」)。小組的主要活動是收集和分析關於破壞赫爾辛基協議條款以及簽約國有關其報導的資料。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團體，它的建立使得政府對持不同政見者採取行動時有所顧慮。更重要的是，莫斯科赫爾辛基小組同起初互不相干的民族宗教運動建立了聯繫，壯大了聲勢。1976年底到1977年初在民族運動的基礎上建立了烏克蘭、立陶宛、格魯吉亞、亞美尼亞的赫爾辛基小組。1977年還在莫斯科赫爾辛基小組之下設立了「為政治目的而運用精神病療法監督委員會」。由於反對派人數增加，並有聯合起來的趨勢，蘇聯政府就加大了壓制的力度。1977年2月，奧爾羅夫和魯登科(Mykola Rudenko)被捕，引起國外抗議。1979年蘇軍出兵阿富汗之後，政府更漠視世界輿論。在這年，薩哈羅夫因反戰而被流放到與外界隔絕的高爾基城。期待着獲釋的持不同政見者再次被投入監牢。對持不同政見者的判決也更為嚴厲，動輒判以十到十五年徒刑。對這些政治犯的監視也更加嚴密。政府的嚴厲措施取得了效果，由於五百多位領袖在短時期內被逮捕，運動一時群龍無首。許多反對派精神領袖被迫移居國外，知識界也變得一片寂靜。

1974年到1975年，蘇聯的持不同政見運動受到廣泛的國際認可聲援。1976年到1981年，蘇聯簽署了《赫爾辛基協定》，成為維權運動重新活躍的標誌。同時，蘇聯政府也加大了壓制的力度。1977年，奧爾羅夫和魯登科被捕；1979年蘇軍出兵阿富汗，薩哈羅夫因反戰而被流放。由於五百多位領袖在短時期內被逮捕，運動一時群龍無首。

四 持不同政見運動的歷史意義及其影響

蘇聯的持不同政見運動存在，貫穿赫魯曉夫執政後期到勃列日涅夫 (Leonid Brezhnev) 當政的整個時期，直到戈爾巴喬夫 (Mikhail Gorbachev) 改革前夕。形形色色的持不同政見運動，是蘇聯社會高度集中、一致的社會表層下的一股潛流，表明蘇聯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存在着問題與危機，是預示蘇聯盛極而衰的徵兆。蘇聯的持不同政見運動是俄羅斯自由主義在當代的餘緒和迴響。

十九世紀初，發端於歐洲的自由主義已經哺育了俄國的一代知識份子：拉吉舍夫 (Aleksandr Radishev)、十二月黨人等等。1861年後，在沙皇政府推動的改革下，自由主義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並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中達到了頂峰——「二月革命」標誌着自由主義的勝利，但卻曇花一現，又被新的、更激進的革命推翻。從此以後，自由主義就退出了俄國政治舞台，但其影響並未消失。在布爾什維克掌握政權的最初幾年，俄羅斯還保留着諸如社會革命黨這樣的政治派別，他們甚至還具有某種政治反對派的色彩；但是由於布爾什維克的容忍有限，它們還是從政治生活中消失了，布爾什維克成了全國唯一的合法政黨。在斯大林時期的高壓之下，反對意見和不同聲音表面上似乎銷聲匿迹，但是到政策相對溫和的時候，人民的各種意見就會在不同程度上表達出來。

持不同政見運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影響。這首先是因為那些思想較為活躍和開放的科技人員、作家、藝術家等等，他們更能接受西方社會的思想文化，感受到蘇聯與先進西方國家之間的差距。逃到美國的蘇聯外交官謝甫琴科在回憶錄寫到了蘇聯對人民的宣傳與實際情況差別之大^⑭：

也許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報紙、雜誌、書籍、電視和廣播提供了內容豐富、數量極多的形形色色的材料。我還發現我能在出售國際書刊的書攤上買到《真理報》和各種蘇聯期刊。我們曾被告知，美國封鎖有關我國的情況，因為它不想讓美國人知道我們蘇聯生活得更好。

正如俄羅斯十七世紀出現的分裂派宗教運動，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是蘇聯意識形態方面的分裂派。加入持不同政見運動的既有作家、藝術家、科技人員，也包括大學生、工人以及軍人，而知識份子往往是這些運動的核心。別爾嘉耶夫 (Nikolai Berdiaev) 說過：俄國知識份子精神上的哥薩克。而本世紀初俄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司徒盧威 (Pyotr Struve) 也曾經有一段精彩的論述^⑮：

普加喬夫起義是哥薩克領導人民下層反對國家的最後一次嘗試。隨着這一嘗試的失敗，作為一個帶給人民群眾以無政府主義和反國家思潮的成分，哥薩克就退出了政治舞台。俄羅斯生活中的另一新成分成熟，無論它在社會生活和日常生活中如何不類似於哥薩克，但它在政治意義上卻代替了哥薩克，是他的歷史繼承人。這一成分就是知識份子。

十九世紀初，俄國出現了受歐洲自由主義哺育的一代知識份子。1861年後，自由主義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並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中達到了頂峰，但卻很快被更激進的革命推翻。在布爾什維克掌握政權的最初幾年，還保留着諸如社會革命黨這樣的政治派別，但是由於布爾什維克的容忍有限，它們還是從政治生活中消失了。

有人從持不同政見者從事一些秘密、違法的地下活動這一特徵出發，認為持不同政見者像沙皇時期的民粹派、布爾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一樣，是革命家。依照俄羅斯經典作家對知識份子的定義，知識份子幾乎等於革命者，那麼在這個意義上，蘇聯的知識份子群體正是這樣的革命家群體。他們關注祖國乃至全人類的前途與命運，並願意為之承擔苦難。在與政權之間實力懸殊的對抗中，他們付出了沉重代價：許多人被迫移居國外，或被流放、監禁，或被送到精神病療養院。

在持不同政見者集團中，宗教集團以及民族主義傳播、散布的乃是上世紀末或者本世紀初活躍在俄羅斯思想界的宗教哲學家以及當代流亡國外的僑民思想家如別爾嘉耶夫等人的作品與思想。這些思想家代表了俄羅斯文化的傳播、延續與發展，並且具有自由主義的色彩。身處西方的俄僑知識份子則在1917年之後的很長時期裏（通常認為，從1917年到蘇聯解體前，共有三代俄國流亡知識份子：分別為1917年以後、二戰以後以及70年代以後三個時期；而最後一個時期則多數為持不同政見者的流亡者），在文學、藝術、哲學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無疑是對蘇聯社會的莫大諷刺。蘇聯政府的文藝政策排斥了那些不合政治標準的文學藝術，對文化實行禁錮和壓制；而那些「秘密文學」和其作者則在某程度上保持了自己的創造力，發揮自己的才華。我們可以舉出一長串耀眼的名字，他們分別活躍在1917年以後的不同時期：哲學家如弗蘭克（Semyon Frank）、斯特本（Fedor A. Stepun）、基斯加科夫斯基（Bogdan A. Kistiakovsky）、別爾嘉耶夫、舍斯托夫（Lev Shestov）等等；文學家如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美國小說家）、特羅亞（Henri Troyat，法國科學院院士）、蒲寧（Ivan Bunin，1933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以及第三代流亡者的代表人物索爾仁尼琴等等，藝術家則以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拉赫瑪尼諾夫（Sergei Rachmaninov）等人為代表。1967年，布爾加科夫（Mikhail A. Bulgakov）的名作《大師與瑪格麗特》（*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在完稿近三十年後首次在蘇聯出版，立即引起轟動。作家巴烏斯托夫斯基（Konstantin Paustovsky）發出遺憾的抱怨^⑥：

一些微不足道的書籍（在蘇聯）被當成是傑作，而優秀的作品卻被束之高閣，直到寫出這些作品二十五年之後才重見天日。這種損失是無法彌補的。假如像普拉東諾夫和布林加科夫這些作家的作品，寫完後就能和讀者見面的話，那麼，我們所有人的思想就會比現在不知豐富多少倍了。

實際上，正是那些僑居國外的俄羅斯知識份子的創作活動，與蘇聯國內一些正直的知識份子的地下創作活動，豐富了俄羅斯的思想文化，使因革命導致出現分層和斷裂的俄羅斯思想文化得以延續和發展。這些私下傳播的思想是二十世紀80年代後期以來俄羅斯人民的重要精神資源，並為以後反對蘇共的活動提供了一定的群眾基礎。可以說，甚至早在戈爾巴喬夫改革之前，意識形態已經難以維持其在精神生活領域的壟斷地位。正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使得持不同政見者的那些口號和主張合法化，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只是對日益強大的

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是蘇聯意識形態的分裂派。加入持不同政見運動的既有作家、藝術家、科技人員，也包括大學生、工人以及軍人。別爾嘉耶夫說過：俄國知識份子精神上的哥薩克。依照俄羅斯經典作家的定義，知識份子幾乎等於革命者。那麼，在這個意義上，蘇聯的知識份子群體正是這樣的革命家群體。他們在與政權之間的對抗中，付出了沉重代價。

思潮的迎合和回應，從而也如1861年前後的沙皇政府的政治體制改革一樣，戈爾巴喬夫及其支持者們又身不由己地走上了「官方自由主義」的老路。有人認為，隨着改革的到來，持不同政見運動已經結束，變成了當代的維權運動^⑦。

和其他思潮或運動的發展一樣，蘇聯持不同政見運動的參加者也流品不一。他們當中有人熱衷於權力；有人則只是因為不能從社會獲取想要的事物而心生不滿；有的人缺乏操守；有的人受名利心驅使，熱衷於同西方媒體聯繫，幻想能在一夜間成為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那樣的英雄。這樣的社會成員在任何時代都不是社會的有益成分。著名法官卡明斯卡婭 (Kamenskaya) 曾經參加過許多重大政治案件的審訊，她曾經寫道^⑧：

和其他思潮或運動的發展一樣，蘇聯持不同政見運動的參加者也流品不一。著名法官卡明斯卡婭曾經寫道：「我有機會遇到那些因參加持不同政見運動而在後來很有名氣的人。有時候我覺得，他們中的某些人太沉迷於政治鬥爭的熱情之中。當我想到，如果突然之間發生了他們掌握政權的事情，這是我所不情願的。」

現在已經習見的術語диссидент，инакомыслящий在當時只是受到公認。在那些年代，我有機會遇到那些因參加持不同政見運動而在後來很有名氣的人。……

有時候我覺得，他們中的某些人太沉迷於政治鬥爭的熱情之中。在同他們談話時，我能明顯地感覺到，他們在爭取表達自己的意見的自由的同时，對別人的意見和信仰不夠寬容，他們缺乏必要的約束，不夠慎重地支配那些同情他們的人們的命運。

……他們當然是一些可敬而且很勇敢的人，但是當我想到，如果突然之間發生了他們掌握政權的事情，這是我所不情願的。

持不同政見運動是一場公民運動，其追求的方向和目標多半是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這可以從後來俄羅斯的制度演變中看出。1994年，在俄羅斯聯邦最高委員會主席哈斯布拉托夫 (Ruslan Khasbulatov) 的主持之下，俄國國家杜馬通過一項議案，聲稱：「在蘇聯政權的歲月裏，有千千萬萬的人們成為極權主義國家崩潰的犧牲品，他們因為政治和宗教信仰而遭到鎮壓。」^⑨該法律的目的是在於「為那些在1917年10月25日（西曆11月7日）以後在俄羅斯聯邦境內的所有政治鎮壓的犧牲者平反，恢復其公民權，消除政權崩潰帶來的其他後果，並保證在目前就盡力為他們的物質和道義損失做出賠償」^⑩；其中當然包括為那些持不同政見者平反。這種政治評價在很大程度上當然是對蘇聯共產黨的否定，同時也打擊了以久加諾夫 (Gennady Zyuganov) 為首的俄羅斯共產黨；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從法律上肯定了持不同政見運動是一種正當的活動和要求，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到俄國社會的認同，因為它與對新制度的認同聯繫在一起。

持不同政見運動不單是一段歷史，還是今天俄羅斯社會的政治現實：今天活躍於俄羅斯的人權組織就是接過了持不同政見運動的旗幟。1994年，當俄羅斯聯邦對車臣用兵正如火如荼的時候，人權組織就成立了名為「士兵母親」的組織，反對戰爭，並救助在戰爭中失去親人的苦難家庭。

對於蘇聯持不同政見運動的研究來說，依舊有許多問題沒有弄清楚：例如，至今沒有人對蘇聯持不同政見運動的參加者做過社會學分析。在資料方

面，一方面是大量的文獻在不斷發表：包括學術著作、原始檔案材料、散文、隨筆、持不同政見者的回憶錄等等；但另一方面，蘇聯政府對當時國內形勢所做的判斷、對策以及秘密指示，國家安全部門中有關持不同政見者及其他政治犯的檔案至今仍未徹底開放，這就為歷史學家的研究帶來極大困難和不便。有人開玩笑說：安德羅波夫 (Yuri V. Andropov) 是有關蘇聯國家安全與持不同政見運動的第一位史學家。是的，許多歷史學家求之不得的研究資料，仍舊平靜地躺在一些絕密檔案館的角落裏。而且，直到今天，在俄羅斯這樣的國家裏，對於歷史的評價，要公布哪些檔案，其取捨仍舊取決於政治上的需要。因而，要徹底、全面、客觀地研究這一問題又談何容易。

註釋

- ① *Словарь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54), 8:809.
- ② *Советская больш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72), 8:313.
- ③ *Совет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осква: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83), 396.
- ④⑩ 謝甫琴科 (Аркадий Н. Шевченко) 著，王觀聲等譯：《與莫斯科決裂》(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6)，頁15；103。
- ⑤ Seymour Martin Lipset, ed., *The Encyclopedia of Democracy*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1995), 2:361.
- ⑥ 電子出版物，*Универсаль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Диссиденты в СССР"* 詞條，www.yandex.ru。
- ⑦ А. Н. Сахаров, *Россия в 20 веке. Историки мира спорят* (Москва: Аст, 1994), 615.
- ⑧⑫ А. В. Савелье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своеобразие диссидент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СССР 50-х—70-х годов",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no. 4 (1998): 109; 111.
- ⑨ Н. Верг,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1900-1991* (Москва: Весь мир, Инфра-М., 2000), 410.
- ⑭ Людмила Алексеева, *История инакомыслия в СССР* (Вильнюс-Москва: Весть-Вимо, 1992), 191.
- ⑮ Т. А. Павлова,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ацифизм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no. 8 (1999).
- ⑯ 電子出版物，新公布蘇共中央絕密檔「蘇共中央行政機關部門副主任薩文金 (Савенкин) 信件」，見www.yandex.ru，頁24。
- ⑰ И. Новиковал, И. Н. Сизем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власть, народ*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3), 191.
- ⑱ 馬克·斯洛寧 (Марк Слоним) 著，浦立民、劉鋒譯：《蘇維埃俄羅斯文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頁370。
- ⑲ 電子出版物：*В каждом доме интеллигента есть самиздаты*, www.yandex.ru。
- ⑳ Ю. Н. Афанасьев, *Советск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Москва: РГГУ, 1996), 403.
- ㉑ Н. Бугай, А. Н. Козонис,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народов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ИНСАН, 2000), 95.